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中国侨生政策演变考析*

陈 非 儿

一般而言，侨生是指回到祖国求学的华侨子弟^①。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至少有 6.4 万名侨生回国，东南亚特别是印尼侨生构成其中的主体^②。与一般归（难）侨“按籍安置、面向农村”或集中于华侨农（林）场不同，侨生因“华侨”与“学生”身份而在教育和侨务领域受到双重照顾。国家为他们成立补习学校、设置奖助金，并在高考中优先录取。

理解中国侨生政策的演变需要参考侨务政策大背景。因国内外形势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侨务政策经历明显调整。国内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与台湾当局斗争、争取华侨而出台的归侨、侨眷优待政策被逐渐取消^③。国际方面，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参加万隆会议，希望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说服华侨入籍当地，成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的突破口^④。学者们基本认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存在侨务政策的调整，但对调整的原因及表现有不同看法，并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揭示某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中国试图在外交层面将华侨与祖国剥离的同时，积极维系甚至加强华侨与祖籍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这集中表现在争取侨汇方面^⑤。这恰恰反映侨务政策变迁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受国内、国际形势及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侨生回国求学的历史现象或许能提供一个观察侨务政策演变的切口，折射出内政与外交、宏观与微观因素的互动。

现有侨生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以侨生为主体，考察他们回国后的艰难适应过程^⑥；第二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流变研究”（22CDJ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考虑到侨生身份与优待政策相关联，“成为侨生”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如年龄、侨居时间及海外关系等，并取得中国驻外使领馆、侨团或侨校的证明书和介绍信。参见《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处关于转发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华侨、侨眷、归侨、回国华侨学生身份的解说的通知》（1957 年 12 月 16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0-2-46-1。

② 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回国升学侨生人数尚存争议，此处笔者根据档案材料统计，1949 年至 1963 年经侨务部门接待的侨生人数为 6.4 万。参见《中侨委二司张帆司长报告》（1964 年 4 月 20 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4011-002-0051。

③ 关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内容，参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44—281 页；任贵祥：《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第 89—95 页。

④ Skinner, G. W. (1959).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21, pp. 136-147. Cariño, Theresa C. (1985).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pp. 20-33.

⑤ 参见 Fitzgerald, Stephen. (1972).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2)*.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terson, Glen. (2012).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im, Jin Li. (2019). *The Price and Promise of Specialne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verseas Chinese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9*.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⑥ Godley, Michael R. and Charles A. Coppel. (1990). "The Pied Piper and the Prodigal Children. A Report on the Indonesian Chinese Students who went to Mao's China". *Archipel*, 39, pp. 179-198; Chan, Shelly. (2014). "The Disobedient Diaspora: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Mao's China, 1958-66".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0, pp. 220-238. 按：还有数量庞大的华侨口述与自传可划入此类，在此不赘列。

类利用美国及台湾地区档案,研究二者如何争取侨生、介入华侨教育问题^①。目前,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侨生政策的考察还较为薄弱^②。有鉴于此,本文将梳理这一时期中国侨生政策的演变历程,探求侨生政策转变的多重原因,并尝试探讨侨生问题与冷战、东南亚国家去殖民化问题的复杂关系。

一、冷战背景下侨生回国升学的多重因素

20世纪以来,华侨学生有回国接受教育的传统,中国政府亦比较重视侨生回国升学问题。晚清时期曾设立专门学堂帮助侨生补习,此即暨南学堂的由来^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英法荷殖民地的南洋遭战火波及,侨生纷纷回到祖国避难。国民政府设立膳食贷金与特种救济金,给予侨生生活上的照顾和学业上的安置。在国民政府所奉行的“移、殖、保、育”四大侨务政策中,“育”被视为侨务的总枢纽,也意味着华侨教育是保侨的桥梁和基础^④。因此,20世纪上半叶,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现象,是华侨传统和中国侨务政策延续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开启去殖民化进程,对华侨教育施加诸多限制,这成为侨生回国升学的新推力。20世纪50年代马来亚提倡马来文为国语,并以此培养学生的马来亚国家观念;政府还以津贴诱导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中学,其核心目的是限制华文教育的发展^⑤。到1962年初,由于经费困难,在72所马来亚华文中学中已有55所改为国民中学^⑥。印尼政府担心华校教学及其中的国共党争,可能会威胁印尼民族国家统一与身份认同,因此加强对教学活动的监督,增加印尼语言与史地课程,以引导华校融入当地。1957年《监督外侨教育条例》颁布后,印尼1100多所华校被改为国民学校,华校学生数量从45万锐减至15万^⑦。与此同时,泰国和菲律宾分别提出华侨教育的“泰国化”和“菲化”改造,1948年至1955年泰国华校学生从17.5万人减少到5万人^⑧。

在冷战背景下,侨生的去向被赋予人心之争的象征、政权合法性的指示等意义,中国、美国及台湾当局都积极争夺侨生,这从多方面影响着侨生升学的选择。新中国的成立引发美国对所谓共产

-
- ① 参见 Oyen, Meredith. (2010). "Communism, Containment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Zheng Yangwen et al.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pp. 59 - 93; 刘雄:《建国初期美国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内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张杨:《“海外华人项目”与美国反华保台之心理战政策初探》,《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张杨:《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美国研究》2015年第3期;翟韬:《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1949—1965)》,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陈月萍:《美援侨生教育与反共活动(1950—1965)》,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2003年;Wong, Ting-Hong. (2016). "College Admissio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Cas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in the 1950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56 (2), pp. 331 - 357.
- ② 例如有学者利用广东、福建部分档案,勾勒侨生回国的某些侧面,但未能将档案与其他史料相结合,论述也较为简略;还有学者研究归侨知青,侧重于1963年之后归侨学生及青年在国内的融入经历,而非关注侨务政策变化。参见上官小红:《建国后归国侨生安置工作探析》,《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叶青、杨雅丽:《福建归侨知青及其安置情况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3期;易海涛、叶青:《“根据特点,适当照顾”:上山下乡历程中的归侨知青》,《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 ③ 林思温:《暨南学校沿革史》,罗志欢等编:《中国近代华侨教育史料丛编》,齐鲁书社,2019年,第1166页。
- ④ 周尚:《战后华侨教育》,《教育杂志》1947年第1期,第96—101页。“移、殖、保、育”分别是指,鼓励国人向海外发展,协助国人在海外立基,护卫国人在海外安全,教育国人在海外滋长。
- ⑤ 李盈慧:《“回国”升学?:星马华裔青年与海峡两岸关系》,李志贤主编:《东南亚与中国:连接、疏远、定位》,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9年,第96—97、111—113页。
- ⑥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 ⑦ 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华族研究》,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63页。
- ⑧ Skinner, G. W. (1959).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140.

主义扩张的严重担忧，东南亚华人因数量庞大和地缘位置重要而引起美国政府重视。1950年，美国政府评估认为，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亚洲冷战政策成败至关重要。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海外华人项目”，其目的在于“离间海外华人社会与中共，争取其对自由世界的支持”；1954年该项目重点转移到侨生教育方面^①。美国新闻署（处）及私人基金会为控制东南亚华侨教育，阻止侨生赴大陆升学，花费数百万美元。或采用多种媒介宣传诋毁新中国；或援助台湾当局改善教育机构，吸引侨生赴台升学；或支持新加坡南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侨生提供其他高等教育选择^②。

与此同时，海峡两岸在争夺侨生方面存在大致相同的认识和做法。双方都认为除了侨生的培养潜力之外，争夺侨生本身就会给对方造成打击。1956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做好侨生工作，不仅可为国内建设培养人才、密切华侨与祖国的关系，还可让侨生学成后回侨居地服务，以打击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对华侨青年的争夺^③。台湾当局奉行“无侨教即无侨务”方针，认为保护海外侨校、争取侨生是侨务最重要一环^④。1956年7月，台湾侨务部门负责人郑彦棻指出，争取侨生除了本身的人才意义外，还有另外两层重要意涵：一是从国际观来说，许多外国人主要用侨生去向衡量华侨民意的向背；二是从国共之争来看，侨生回台湾可以打击中共的海外宣传及统战工作^⑤。

二、积极争取：20世纪50年代初的侨生政策

在侨居地推力及祖国拉力之下，新中国成立之初，侨生回国人数不断增加。1949年至1950年回国侨生超过1600人，1951年达2200人，1952年达5400人^⑥。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成立，调查海外华侨情况、重建华侨与祖国联系是其主要目标，协助侨生回国是其具体工作之一^⑦。广东作为侨生回国的主要落脚点，1950年6月，省侨委率先颁布优待侨生回国就学暂行办法，帮助侨生补习文化与政治课程，从宽录取侨生，并为贫寒侨生提供助学金^⑧。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抗美援朝成为1951年侨务的中心工作。中侨委鼓励归侨、侨眷通过书信加强与国外的联系，以促进华侨踊跃捐献^⑨；教育部也将侨生回国视为“关系海外政治影响和华侨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指示各地将照顾侨生入学“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不仅为侨生在广州设立考区，给予课业帮助和补考机会并照顾录取，还在南方大学内特别设立华侨学院^⑩。

1953年，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及“一五”计划的实施，侨生政策与措施开始走向正规化。当年

① 张杨：《“海外华人项目”与美国反华保台之心理战政策初探》，《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

② 翟韬：《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1949—1965）》，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张杨：《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张杨：《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美国研究》2015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问题的意见”（摘要）》（1956年6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4辑），1956年印行，第1—2页。

④ 郑彦棻：《华侨文教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海外出版社，1957年，第16页。

⑤ 《蒋帮郑彦棻报告“侨务工作的重点及其发展”》，《侨情参考资料》第440期（1956年8月2日）。

⑥ 《中侨委二司张帆司长报告》（1964年4月20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1-002-0051。

⑦ 《致函海外华侨社团》，《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8日。按：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本文仍简称“中侨委”。

⑧ 《广东侨务工作在开展中》，《人民日报》1950年8月22日。

⑨ 何香凝：《中侨委第一次侨务扩大会议开幕词》，《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1页。

⑩ 《教育部关于照顾归国华侨学生入学的暂行办法》（1951年7月21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99页；《南方大学华侨学院招生简章》（1951年7月1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07-1-23-8-8。

经侨务部门接待回国的侨生达 8400 人，开启侨生回国的第一个高潮^①。8 月，高教部、教育部和中侨委联署的《关于长期收容处理华侨学生工作方针与方案的报告》，成为指导新中国侨生工作的第一份专门文件^②。报告首次对投考中等和高等学校的侨生作出区分，对安插地点、照顾程度予以具体说明，并对逾考期回国和落榜侨生的安排、专门侨校的建立作出批示。从地点来看，安插侨生的中等学校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兼顾传统侨区以及与东南亚联系密切的边境省份；高等学校则集中于沿海、沿江大城市。中等学校的照顾尺度进一步放宽，由考试录取改为能跟班上课即可。北京和广州成立专门的侨生招生委员会，分别举行 4 次和 3 次入学考试，以充分保证侨生入学机会。前者负责京津两地，后者负责广州、上海、南京、武汉四地侨生招考及分送入学。^③逾考期回国和落榜侨生可以进入华侨补校补习，或通过各高校插班考试入学。除了特定 10 所院校或专业之外^④，其他高校均须接受侨生申请参加插班考试。如侨生插班考试未通过，还可参加全国统考，相当于多一次报考机会。^⑤

11 月初，廖承志在全国侨务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此前中央及侨务部门曾担心侨生回国会削弱华侨社会力量，因而“存在着一种消极的阻挡华侨学生回国的想法”。随着国内和东南亚形势变化，侨务部门逐渐认识到，侨生并非华侨社会中坚，转而希望通过侨生加强华侨与祖国的“血肉联系”。^⑥此次侨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外出席代表达 412 人，涵盖东南亚、欧洲和美洲等地区。可以说，廖承志的报告是向整个华侨社会宣告新中国欢迎侨生回国。^⑦

国内欢迎侨生的政策与氛围，还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传导至海外华侨社会，间接促进侨生选择回归新中国。以印尼为例，新中国不仅在当地华侨社会举办图片展、放映中国电影和纪录片，介绍新中国发展情况，驻印尼大使和领事还亲自到当地华侨学校演讲，鼓励侨生回国。1951 年至 1952 年，中国驻印尼总领事两次前往雅加达中华中学为侨生作报告，介绍祖国高校将从 1952 年起为学生免除学费，提供生活费和公费医疗。这对很多学生极具吸引力，被称作“破天荒的及时雨”^⑧。此外，华侨回国观光团及国内侨生的报告或书信，也激发侨生的回国兴趣。观光团成员回到侨居地

① 据中侨委统计，1953 年至 1955 年每年回国侨生人数超过 7000 人，1956 年回国侨生人数只有 4200 人，由此 1953 年至 1955 年可视为侨生回国的第一个高潮。上海、广东两地相关部门的报告亦印证了这一点。1953 年 9 月上海市教育局指出：“1952 年以前本市归国华侨生为数不多，均由民政局介绍零星入学。从 1953 年开始侨生大量增加。”广东省侨委安置归（难）侨的数据显示，1950 年至 1952 年归侨转升学人数为 175 人（归侨总人数为 15833 人），这一数字在 1953 年就攀升到了 1163 人（归侨总人数为 5689 人）。参见《中侨委二司张帆司长报告》（1964 年 4 月 20 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4011-002-0051；《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情况及处理意见的函》（1953 年 9 月 24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05-5-940-48；《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安置处理归、难侨情况》，广东省统计局编：《广东省国民经济建设八年成就（1949—1957）》，1958 年印行，第 147 页。

② 《关于长期收容处理华侨学生工作方针与方案的报告》（1953 年 8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 1 辑），1954 年印行，第 1—4 页。

③ 《中央侨委会文教宣传司对华侨回国观光团有关归国华侨学生入学问题的宣传要点》（1953 年 10 月），《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84 页。

④ 这 10 所高校或专业是北京航空学院、华东航空学院、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军委系统高等学校、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

⑤ 《中央人民高等教育部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插入高等学校的办法》，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 2 辑），1954 年印行，第 9—10 页。

⑥ 廖承志：《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的若干问题》（1953 年 11 月），《廖承志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40—241 页。

⑦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1953 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年，第 715—716 页。

⑧ 参见饶群章：《赤子情怀，壮心不已》，林明江主编：《荆山楚水系侨心 湖北归侨口述录》，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年，第 246 页。按：饶群章放弃受资助留学美国的计划，1952 年 7 月回国，9 月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

后往往会公开演讲、介绍祖国的大好形势，还有华侨尚在国内观光时就致信子女尽快办理回国手续^①。例如，1951年至1954年间陆续回国的黄汉光、吴珠治和陈榜伟，都受到哥哥姐姐从中山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来信的鼓励^②。

侨生回国逐渐成为一种潮流。1950年7月，第一批印尼侨生启程回国。当时印尼首都雅加达并没有开往中国的客轮，70多名侨生只能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谈判，请求将他们当作“货物”运回祖国。获悉台湾当局准备在台湾海峡拦截这批侨生，中国与太古公司几番交涉才保证他们顺利回国。^③无怪乎在当年8月中侨委举办的归国华侨学生招待会上，廖承志特别祝贺侨生们“安全渡过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国民党匪舰的封锁”回到祖国^④。此后，有多批次印尼侨生陆续回国，尤以暑期居多。^⑤

1949年至1953年可视为侨生回国的第一阶段，各地侨务机构接待和安置侨生达1.9万人，加上分散入学或直接工作的，估计达2万至3万人^⑥。

北京、广州和集美三大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简称“华侨补校”）的开办，标志着侨生安置工作的常态化和机制化。1953年以前，回国侨生多被临时安排在华侨招待所或侨生接待站。北京华侨补校就曾在东堂子胡同、大方家胡同等地流动办学，直到1953年9月才建成位于阜成门外的新校舍，燕京大学侨生先修班也就此并入该校。为体现国家对侨生的照顾，补校新校舍拥有教学楼、办公楼、男女浴室和标准足球场、室内游泳池等一流硬件设施。^⑦为分流不断前往北京的侨生，1953年底，中侨委开始筹建广州和集美华侨补校。1955年，广州华侨补校石牌新校舍启用，次年学生规模即扩大到五六千人^⑧。集美补校则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基础上边办学边扩建，到1954年也已招收侨生910名^⑨。广州华侨补校仅在1954年至1958年期间，就向各地正规学校输送1.2万余名侨生^⑩。

华侨补校既是接待和安置侨生的中转站，也是连接海外华校和国内普通学校的桥梁。如果说侨生是祖国建设的宝贵“原料”，海外侨校负有提炼“原料”的任务，华侨补校则是“加工厂”。因侨生回国时文化程度不一，故而需要经过一番“加工”后，才能分配到祖国各地学习。^⑪这个比喻

-
- ① 参见林得春：《“泄密”的伤害》，王一心：《我们回家：新中国初期华侨归国记》，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陈笔春：《永远扎根于祖国》，林明江主编：《燕赵赤子绘宏图 河北归侨口述录》，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第28页；张碧如：《花红柳绿还初春》，林明江主编：《钱江侨杰数风流 浙江归侨口述录》，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
 - ② 黄汉光：《如果生命重来一次，我还是选择回国》，《燕赵赤子绘宏图 河北归侨口述录》，第108页；吴珠治：《给世人带来更多的健康》，《燕赵赤子绘宏图 河北归侨口述录》，第283页；陈榜伟：《祖国和人民把我培养成养猪专家》，林晓东主编：《风雨人生报国路 山西归侨口述录》，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第31页。按：黄汉光195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吴珠治1954年考入河北医学院，陈榜伟1955年考入山西农学院。
 - ③ 参见陈非儿采访梁立基的记录（2017年8月13日）。
 - ④ 《欢迎最近归国侨生》，《人民日报》1950年8月17日。
 - ⑤ 参见《侨生集体回国升学》，《侨讯》第45期（1951年7月28日）；《三百名华侨学生从泗水启程返国》，《侨讯》第142期（1953年7月16日）。
 - ⑥ 《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的若干问题》（1953年11月），《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1辑），第5—6页。
 - ⑦ 傅克、刘明明：《磨砺89：一个老八路的跌宕人生》，团结出版社，2012年，第218—238页。
 - ⑧ 陈丹等编：《甲子心迹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建校/校60周年纪念特刊》，2013年印行，第6—23页；陈非儿采访徐元昭的记录（2017年12月28日）。按：徐元昭1952年6月从印尼回国后，9月任北京华侨补校侨生生活指导员，并参与北京华侨补校新校舍筹建工作。1953年12月被派往广州协助开办广州华侨补校。
 - ⑨ 周日升：《集美学校八十年校史》，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176、190页。
 - ⑩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八：华侨港澳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 ⑪ 《观光团张湘海在巨港报告我首长对国外侨教的指示》，《侨讯》第329期（1955年6月13日）。

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海外侨校和国内补校在侨生教育领域的角色与分工。具体来看,补校负责逾期回国、文化程度较低及分送普通学校后再次回流的侨生安置工作。其中暑期(7月至10月)主要用于侨生的接待、考试和分送入学,其余时间则用来编班测验,对侨生进行文化和政治补习^①。补校贯彻“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实行补习教育而非学制教育。在补习教育中,政治补习是重中之重。通过政治补习帮助侨生了解中国革命基本知识,并从爱国主义教育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②。在生活方面,补校为侨生免除学杂费,提供助学金和福利基金补贴生活。1953年集美补校开办之初,为侨生设立15%的助学金及福利金名额,侨生可领取每月12元的助学金及每年60元的福利金^③。与国内普通学校相比,补校硬件设施更优越,教师对东南亚与华侨情况较熟悉,能够照顾侨生的生活需求,集中安置也可有效缓解侨生回国后面临的文化冲击。

三、针锋相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政策完善和改进

越来越多的侨生选择回到祖国大陆,引起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注意。美国国务院估计1953年有2.2万名港澳及东南亚学生回中国大陆升学,台湾当局诬称中共或将侨生作为共产主义扩张的“第五纵队”以及勒索海外侨汇的“人质”。为此,台湾当局放宽侨生入台要求、简化入台手续,并扩大名额以争取侨生。^④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提议,台湾方面应出于反共目的招收东南亚侨生,以阻止他们回大陆升学,美国愿拨款支持,此即“美援侨教计划”^⑤。此后,台湾当局将以往许多停留在规划中的侨生政策付诸实践。1954年至1965年,美国向台湾侨务和教育部门提供援款3.1亿多元新台币及100多万美元,帮助台湾方面吸引侨生2万余人^⑥。1956年,美援侨生教育经费显著增加,以新台币和美元支付的部分,分别是前一年的4.6倍和8.7倍^⑦。与此同时,美国将注意力放在东南亚华人学生及其教育问题上,1955年批准“海外华人学生项目”,1957年专门制定长达70页的东南亚华人项目指导纲要^⑧。这些文件的相当篇幅是以侨生为目标群体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侨生提供新中国之外的升学选择。

中侨委和教育部也注意到,“美蒋争夺华侨学生与港澳学生的活动日益加紧,被诱骗到台湾学习的华侨、港澳学生逐年增多”,强调争取侨生和港澳生是粉碎美蒋阴谋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各地正确认识侨生回祖国大陆升学和港澳生回内地升学的重要意义,克服因政治情况复杂而视他们为“包袱”的看法。同时,放开对侨生报考高校的专业限制,允许通过审查的侨生报考机密专业或重要专业。逾期回国的侨生或港澳生,不仅可以通过补考进入普通中学,还可以参

① 《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侨务扩大会议上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报告》(1953年11月),《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1辑),第20—22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改进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工作的决定》(1955年3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3辑),1955年印行,第21—27页。

③ 《中央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福建集美学校附设“厦门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办理方案》(1953年11月),《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1辑),第41页;《市教育局关于中学人民助学金发放问题和归国华侨学生生活福利补助方法的请示及市府的批示》(1954年6月29日至10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006-00264。

④ Wong, Ting-Hong. (2016). “College Admissio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Cas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in the 1950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56 (2), pp. 345–346.

⑤ 曹曦:《美援与战后台湾教育》,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⑥ 陈月萍:《美援侨生教育与反共活动》,第62页。

⑦ 赵既昌:《美援的运用》,联经出版社,1985年,第199—200、190—193页。

⑧ Mig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Southeast Asia to Communist China outlined. Feb. 7, 1955. CK2349007108.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Gale Group, Inc (hereafter *USDDO*).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CB Report, Dec 11, 1957. CK3100159358. *USDDO*.

加由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在广州联合举行的补考，通过后即可被三校录取。^① 针对赴台学生以港澳学生和接受高等教育为主的特点，1956年新中国的侨生政策也作出针对性改进：一是以厦门大学为重点，增强侨生高等教育力量，加强对海外华校师资培训；二是加大对港澳学生的争取力度。

在侨生高等教育方面，最重要的是调整厦门大学的发展方向，确定厦大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多吸收侨生的办学方针^②。自1921年陈嘉庚建校以后，厦大与南洋华侨联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亦通过政府对厦大的态度来观察新中国的华侨政策。因此，为彰显新中国对海外华侨的重视，高教部要求厦大承担海外华校师资的培养任务；成立东方语言系，加强对南洋及台湾方面的多学科研究；尽可能多招收侨生，以期达到学生总数的1/3^③。考虑到厦大处于国防前线，侨生可能不愿前往学习，福建省教育厅和省侨委特地动员集美中学侨生，尽量报考厦门大学^④。在这一背景下，1956年首批华侨新生正式进入厦大学习，到1959年5月厦大已有侨生400多名，主要分布在外文系和生物系^⑤。

与此同时，厦大成立全国第一个东南亚研究机构——南洋研究所，研究东南亚国家及华侨相关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前，研究所组织采访归侨、调查福建侨乡及国内侨资企业，成为新中国东南亚研究和华侨研究的起源。为增强海外侨校师资，厦大成立华侨函授部，招收侨居国外、具有高中学历的在职教师和社会青年，期望海外侨生经过两三年系统学习，达到国内专科毕业生程度。函授部与国外侨团、侨校密切合作，协助侨生报名，并以通信方式对函授生进行书面指导。^⑥ 函授部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暂时滞留海外的侨生另一种接受祖国教育、提升学历的机会。1956年至1962年，函授部先后设立数理化和中国语文专修科，招生名额从300多名增至1000名以上^⑦。

港澳生几乎与东南亚侨生同时回内地升学^⑧，1952年至1954年回广州参加高考的港澳生近2000人^⑨。1955年，考虑到港澳生回内地升学，在人才培养、改变亲友对祖国态度以及争取侨汇等方面的意义，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不再将落榜港澳生送回港澳，而由广东省华侨中学统一接收，以打消港澳生对于落榜的顾虑。1956年3月，港澳生补校与华侨补校合办，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⑩

①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做好华侨回国、港澳学生回内地报考高等学校工作的几点意见》（1956年7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666页。

②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问题的意见”（摘要）》（1956年6月7日），《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4辑），第1页。

③ 高等教育部办公厅：《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3辑），1956年印行，第240—242页。

④ 《动员侨生报考厦大的通知》（1956年5月29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48-003-2151-0019。

⑤ 《归国侨生在厦大》，《生活报》（雅加达）1959年5月26日。

⑥ 参见《厦大校长王亚南谈华侨函授部招生情况》，《大公报》（泗水）1956年7月27日；《厦大华侨函授部招生简章》，《大公报》（泗水）1956年7月31日；陈非儿采访李国合的记录（2017年8月14日）。按：李国合1960年考上厦门大学函授班语文专修科。

⑦ 《华侨函授部》，《侨务报》1957年第7期；《厦大华侨函授部招生》，《大公报》（香港）1962年4月30日。

⑧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港澳生在回内地升学时，受到的照顾几乎与侨生相同，但中侨委明确要求，港澳生回内地升学“不应也绝不能当华侨学生处理”，要求侨务部门不能介入，而让教育部门来负责。在中侨委看来，港澳问题是一个带有外交性的重要问题，担心以侨务机关处理港澳问题会给美英等国留下借口，从而影响大陆对港澳的长远方针，因此要明确港澳人民不是华侨，港澳学生也不是华侨学生。但因为港澳生也长期处于英葡殖民统治下，与内地学生迥然不同而与侨生类似，所以同样给予适当照顾。中侨委特别强调港澳生与侨生的身份区别，也从侧面揭示争取港澳生和侨生的外交内涵。参见《中侨委函复对港、澳学生回内地升学问题的处理原则及处理机关问题》（1954年5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5-1257。

⑨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5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323页。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5年卷》，第322—323页；《中共中央同意广东省委关于兴建一个港澳学生补习学校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603页。

7月底，中侨委和高教部估计当年毕业的港澳高中生有3000人，回内地投考者可达1/3。为争取这批港澳生，侨务和教育部门加大照顾力度，港澳生达到最低标准即按志愿录取，未达标准也将其照顾录取到广州高校或厦门大学，同时为错过考试时间的港澳生安排补考，并额外录取1500名港澳生安排在广州，将港澳生集中编班授课，不以国内学生的标准来要求。^①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实施“美援侨教计划”，中国政府调整厦门大学发展方向，并加强对港澳生的争取，海峡两岸对侨生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然而，随着国内教育形势的急剧变化，为减轻侨务和教育部门的安置压力，中国开始有选择地鼓励侨生回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侨生的照顾。

四、从“适当照顾”到“一视同仁”：1957年至1958年的转折

一般认为，1957年底中侨委召开二届一次会议，取消对归侨的优待政策，标志着侨务政策的转折^②。在当年12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周恩来表示，考虑到华侨回国还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面临适应新环境的困难，绝大多数华侨应留在侨居地，应该把劝导华侨留在当地“说得彻底一些”^③。其实，侨生政策在此之前已开始调整。1957年初的华侨教育总方针，更明确和细分要争取回国的对象。从年龄和学段来看，主要争取高中生特别是回国考大学的侨生，对初中生不号召，小学生则被认为不应该回国。在地区上，主要争取港澳学生及尚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侨生。^④

侨生政策调整的宏观背景是新中国侨务工作阶段的转变——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侨务阶段，经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争取华侨为主要目标的第二阶段，进入到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并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侨务目标，在国外是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在国内则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⑤。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争取资本主义国家而非东南亚国家的侨生回国，是为了扩大外交影响，而取消国内侨生优待政策，则有动员侨生参加祖国建设的考虑。

与宏观背景相适应，侨生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1957年国内教育形势的变动。升学率降低导致落榜侨生增加，安置落榜侨生成为侨务和教育部门的一项长期任务。以升学问题为起点，侨生安置政策核心由“适当照顾”转向“一视同仁”，从积极争取到有选择地接收，并鼓励侨生在侨居地升学。

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内高等教育扩招与“适当照顾”政策，促成侨生回国升学的“黄金时代”。1949年底，全国高校共有学生11.7万人，随后两年分别招生5.8万人和5.2万人。1953年实际招生人数达8.2万人，国内高中毕业生开始不敷需要。^⑥1956年，高招计划突破16万人，高中和中专招生计划达80万人，国内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均显不足^⑦。因此，为满足新中国对人才的需求，侨生回国基本都能得到升学机会。1956年，北京华侨补校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录取率超过

① 《国务院关于香港澳门学生回国升学问题的批复 华侨事务委员会、高等教育部、青年团中央关于香港、澳门学生回国升学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667页。

② Fitzgerald, Stephen. (1970).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The China Quarterly*, 44, p. 19; Cariño, Theresa C. (1985).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15.

③ 参见夏莉萍：《周恩来的“单一国籍”思想研究》，《外交评论》2008年第2期。

④ 《广西省人委华侨事务处在广西省教育行政扩大会议上关于华侨工作的发言》（1957年2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案号X042-001-0026-0102。

⑤ 廖承志：《我国侨务工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廖承志文集》，第338—344页；方方：《当前的侨务工作》，《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1—514页。

⑥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18、40、71、103页。

⑦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56年3月20日；《三十五万青年报考高等学校》，《人民日报》1956年7月14日；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6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

80%。南京市则规定能够从初中毕业的侨生全部升入高中，高考未录取的侨生也通过联系高校个别录取，因此南京市侨生的初中、高中升学率分别超过90%和80%。^①1953年至1957年，全国高校从182所增至229所，在校生人数由21.2万人增至44.12万人，累计招收新生超过56万人^②。

教育大发展局面在1956年达到高点后开始收缩。1957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通知指出，1956年学校数量的发展有些盲目，正考虑压缩各级学校招生规模。同月，教育部在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也提出，1956年教育事业的发展超过了可能的条件，师资、设备、基建均跟不上需求。紧接着高教部联合团中央，预警当年某些专业毕业生将供过于求。4月24日，高教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高招新规定，确定1957年高招计划为10.6万人，比1956年减少近8万人^③。6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大部分高中生升入大学的情况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以后中小学毕业生除小部分升学外，多数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④。

在教育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1957年4月底，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号召落榜侨生“下农村”^⑤。5月中旬，中侨委和教育部预估当年升学形势严峻，提前制订落榜侨生的处理预案，包括留原校复习、介绍入补校、参加农业生产等^⑥。然而放榜后的实际情况比预估的还要严重，例如广州华侨补校的499名印尼侨生只有12人被录取^⑦。落榜侨生过多，给各地安置造成很大困难，仅“介绍入补校”一项，就让北京、广州和集美三所华侨补校不堪重负。福建省侨委要求集美华侨补校不对外公布其接收情况，以免侨生过多流动到补校^⑧。11月1日，中侨委和教育部发布补充通知，明确对待侨生原则上与国内学生一视同仁，逐渐取消对他们的特殊照顾，打消侨生升学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要求各地尽量就地安置落榜侨生，严格控制介绍入补校。对落榜侨生的出国审批，其态度也由“一般劝阻”转变为“一般可给予批准”。^⑨在国内侨生政策调整的同时，中央对海外侨生归国的态度也有了明显转变。1957年7月，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在题为《澄清对侨务工作的一些糊涂思想》的讲话中表示，新中国仍对侨生回国升学表示欢迎，但“更重要的还是鼓励华侨在国外办学，使华侨学生在侨居地就能够受到适当的教育”，以就近得到父母照顾且利于在当地的长期生存^⑩。

1958年初，中侨委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标志着侨生政策转折与调整定型。首先，限定回国升学侨生的类型，明确超龄、患病及文化基础差的侨生不宜回国，且回国侨生应由家庭资助而不可依赖国家。接着，在重申“适当照顾”的基础上，更强调对侨生与国内生“一视同仁”。这突出表现在对不守学校规矩的“问题侨生”及落榜侨生的处理方面，要求他们与国内普通学生一样接受处分、留级或下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最后，要求补校“整顿巩固，提高质量”，主要负责接待新归国侨生并酌量收费，清理老侨生并将他们按一般归侨处理。^⑪

① 刘采石：《关于归国华侨学生的升学和补习问题》，《侨务报》1956年第3期；黄敦仁：《武汉、南京二市中等学校对归侨学生进行教育的情况》，《侨务报》1957年第2期。

② 郝维谦、龙正中主编：《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192—193、195页。

④ 李均：《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1949—2009）》，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⑤ 《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正确对待升学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⑥ 《教育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妥善安置初、高中毕业考不上学校的华侨学生的通知》（1957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759页。

⑦ 黄昆章：《执着追求 默默耕耘》，2011年印行，第18—20页。

⑧ 《关于外省介绍侨生进集美补校应注意事项》（1957年8月9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48-003-2215-0009。

⑨ 《教育部、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妥善安置初、高中毕业考不上学校的华侨学生的补充通知》（1957年11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案号X067-002-0085-0014。

⑩ 《侨务政策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页。

⑪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年1月2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2-2-177-21-23。

从1957年政策转变伊始，侨务部门就将宣传作为教育侨生的重要手段。《侨务报》紧紧围绕侨生升学议题组织文章，解释国内升学情况变化，介绍侨务和教育部门针对落榜侨生的安置措施，劝导落榜生从事劳动生产。侨务部门还在该报开辟专栏，以设问形式解答侨生困惑和疑虑，例如考不上学校有哪些出路？考不上学校是否可以进华侨补校？是否可以申请出国？如何向国外同学谈今年回国升学的情况？^①通过回答侨生所关心的升学及落榜问题，明确党和国家对侨生回国及升学的态度。比较《侨务报》第8期至第10期关于落榜侨生工作问题的专题讨论，可以发现其倾向性十分明显。在全部的18篇文章中，有16篇都要求侨生端正劳动态度、不搞特殊化、服从祖国需要^②。在第12期中编辑室还给这一组讨论定调，要求国内侨生摒弃“特殊化”思想，国外侨生放弃对祖国的美好“想象”，接纳和理解祖国的不完美^③。除此之外，中侨委、教育部和团中央要求学校对侨生进行一次系统教育，开展“大争大辩”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导侨生在讨论中认可侨务政策转变符合华侨自身利益和国家外交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动员侨生向海外宣传，说服同学、亲友留在当地升学^④。

然而，在实践层面上，侨生下放农村遇到很大阻碍。一方面，海外华侨家长不理解，他们以断绝关系和断绝侨汇相威胁，阻止侨生离开城市与学校；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侨生不愿意在农村生活和落户，不少侨生私自逃离农村、要求继续升学，甚至还出现部分侨生“逃港”现象。因此，1959年浙江和江苏两省陆续将下放侨生调回城市升学或安排城市工作。^⑤在劝导海外侨生留当地升学、国内侨生下农村等措施之外，侨务部门还采取一系列开源办法拓展侨生安置渠道。在中等教育方面，1957年8月国务院颁布《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动员华侨捐款增加班额，优先录取侨生，或实行二部制教学（分上、下午班）、增设技术补习班和高校补习班、发展侨乡业余中学，扩大接收落榜侨生^⑥。在高等教育方面，1958年9月恢复暨南大学，为侨生和港澳生特设一年制预科班^⑦。半年后暨大招生1200多人，其中六成以上是侨生。暨大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所名副其实的“华侨大学”。^⑧

有学者注意到，1957年之后，官方侨务文件几乎不再提“华侨是统一战线一部分”，侨务工作的重点已明显放在国内^⑨。1958年底，为妥善解决华侨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三好”政策^⑩。相应地，处理东南亚与中国已建交国家的侨生回国升学问题，也要求贯彻“三好”精神——自愿参加当

① 《关于归国华侨学生升学和就业问题》，《侨务报》1957年第6期，第11—12页。

② 《关于欧玉琪工作问题的讨论》，《侨务报》1957年第8、9、10期。

③ 《我们对“欧玉琪工作问题”的意见》，《侨务报》1957年第12期。

④ 《关于传达贯彻“归国华侨学生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的工作计划的联合通知》（1958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5辑），1958年印行，第5—8页。

⑤ 《关于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归国华侨学生的处理问题的批复》（195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七辑），1960年印行，第19—21页；《关于归国华侨学生安置就业问题的联合通知》（1959年6月22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1-003-0019；Godley, Michael R. (1989). “The Sojourner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 62 (3), p. 334.

⑥ 叶滋福：《文昌县积极想办法解决侨属子女就学问题》，王坚、志华：《今年福建省侨属子女的升学与就业问题》，《侨务报》1957年第6期。

⑦ 《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6月1日；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暨南校史（1906—1996）》，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9—127页。

⑧ 《归侨学生的高等教育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4月29日。

⑨ 代帆：《侨务与外交：对中国侨务政策的思考——以中印（尼）关系为例》，《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

⑩ “三好”政策，即华侨自愿加入侨居国国籍，很好；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同样好；华侨愿意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也好。参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第262页。

地国籍，受当地国民教育，这是好的；保留中国国籍，继续在华侨学校学习，也是好的；愿意回到国内升学，也是好的^①。从“三好”的次序来看，此时新中国明显鼓励侨生留在当地升学。与此同时，适用于国内侨生的“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也被重新解释。“适当照顾”主要指对侨生政治思想上的关怀，其次才是对学习和生活的适当安排，不再强调侨生的特殊性或迁就落后的“问题侨生”^②。受1957年国内升学率降低及侨生政策转变的影响，1958年回国侨生仅1700人，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低谷。即使在1958年“教育跃进”的背景下，1959年回国侨生也仅有2800人左右。^③本以为侨生回国升学的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归为沉寂，但随之而来的东南亚特别是印尼排华浪潮，又促成新一波的侨生回国。由此，中国重启20世纪50年代初欢迎侨生回国的政策。

五、排华浪潮下的集中安置与优待：1959年至1962年侨生政策的再次调整

1959年夏，中国周边政治环境开始恶化。印尼掀起反华、排华浪潮，波及面大、持续时间长。起初，中国从民族民主运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反排华斗争不仅是保护华侨利益的举措，还是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体现。^④但随着排华风潮愈演愈烈，1960年初，中国最终决定从印尼撤侨。从2月始，一年内中国累计接侨132个船次，安置包括侨生在内的归（难）侨共计82218人，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归侨人数总和^⑤。排华期间，印尼华校减少约72%，被迫失学的华侨学生达数十万^⑥。第二波侨生回国潮由此形成。

1960年，华侨补校接待和安置侨生约16000人。据《南方日报》估计，1961年前11个月，有近13000名侨生在广东各港口登陆。与20世纪50年代的侨生相比，这批侨生多出生于比较贫苦的工农或小商贩家庭，女侨生数量明显增加（占44.5%）。^⑦中央认定排华是“美帝国主义国际冷战阴谋的一部分”，强调争取侨生对外配合反排华斗争、对内培养人才两方面的意义，并重启欢迎与争取侨生的政策^⑧。

与20世纪50年代分散安插入学不同，新侨生的安置贯彻“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方针。国家扩大原有华侨补校的规模，新建南宁和昆明华侨补校，还在武汉、厦门和海南岛创办华侨工农业技术学校，希望将侨生培养成华侨农（林）场的技术人员^⑨。1960年以前分散安置的侨生，因分送或升学后的人数逐渐减少，侨务和教育部门也开始逐步将其调整为集中安置^⑩。1961年至1962年，恰逢“教育跃进”后的调整，高招人数从1960年的32.3万人削减至16.9万人，1962年进一步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侨务委员会关于华侨学生回国升学若干政策和审批条件问题的通知》（195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侨务委员会编印：《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第6辑），1959年印行，第9页。

② 《关于转发“国家侨务委员会、教育部抄转1958年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关于华侨学生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1959年3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案号X067-002-0338-0015。

③ 《中侨委二司张帆司长报告》（1964年4月20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1-002-0051。

④ 《中侨委方主任在本市侨生干部会上的讲话》（1959年12月2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1-003-0019。

⑤ 《方方副主任在国营华侨农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019-002-0248-0002；《去年归国华侨生产学习各得其所》，《人民日报》1961年2月28日。

⑥ 《华侨教育遭受凶恶摧残 数十万华侨学生被迫失学》，《人民日报》1960年5月26日。

⑦ 《方方副主任在国营华侨农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019-002-0248-0002；Godley, Michael R., and Charles A. Coppel. (1990). "The Pied Piper and the Prodigal Children. A Report on the Indonesian Chinese Students who went to Mao's China". p. 182.

⑧ 《关于大学学生团干部思想作风问题的调查、对归国华侨学生工作的意见》（1960年2月24日至1960年12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1-00709。

⑨ 《国务院批转侨务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建立各类华侨学校加强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1960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001—1002页。

⑩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与反排华斗争问题》（1960年7月3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1-003-0026；《关于中小学华侨学生工作的情况和意见》（1961年5月4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53-001-00640。

至 10.7 万人^①。与此同时，为提高新生质量，教育部取消对部分学生的高考照顾，这增加了新侨生的升学难度。与 20 世纪 50 年代自主自愿回国的侨生相比，排华浪潮下回国的侨生缺乏思想准备，且学习基础薄弱。新建补校缺乏师资，教学资源也较差。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新侨生落榜问题严重。以南宁补校为例，1961 年和 1962 年参加高考的侨生分别为 357 名和 278 名，经学校争取并降低录取标准后，仅有 139 名和 103 名侨生被录取^②。这不到 40% 的录取率，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一度高达 80% 至 90% 的侨生录取率，形成鲜明对比。

考虑到侨生升学问题的敏感性，中侨委要求对侨生升学仍在内部采取“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政策，并在部分地区降低录取标准或按比例分配侨生进入重点大学^③。侨务部门一方面帮助侨生向教育部门和报考院校说明其海外关系情况，以通过政治审查；另一方面对落榜侨生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以示对新侨生的优待。鉴于国内物资供应紧张及升学压力大，侨务部门希望驻外使领馆、华侨社团及华侨回国观光团，在了解国内真实情况后，能够劝导海外侨生“慢些回来”，并放宽侨生出国限制^④。1960 年 9 月，国家在侨乡泉州创办华侨大学，以缓解迫在眉睫的侨生升学压力。根据中侨委的规划，在华侨大学 4000 名学生中，侨生要占 60% 至 80%。虽然侨生回国潮是华侨大学成立的直接原因，但国家也希望发挥侨生优势，将他们培养成热带作物培育、东南亚国家语言翻译、侨务工作和侨校教学等方面的人才。^⑤ 1961 年国家要求华侨大学全部招收侨生，暨南大学主要招收侨生及厦门大学多收侨生，以解决侨生的升学问题^⑥。

1960 年底，印尼排华活动基本停止。随着 1961 年 3 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访问印尼，以及 6 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回访中国并达成有关华侨国籍问题的协议，华侨问题的政治旋涡终于平息。1962 年侨生回国潮基本结束^⑦。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为缓和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开始减少对侨生问题的介入，将美中关系中的华人问题放回到东南亚国家内部事务中^⑧。台湾当局在美援停止后，一面筹措经费，一面减少对侨生的旅费、生活费及学杂费补贴，但仍延续争取侨生的政策。1962 年赴台侨生人数首次超过大陆，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保持这一势头^⑨。

随着侨生回国人数减少，华侨补校的性质与任务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海外华文教育受限，尤其是华侨中学办学困难、侨生减少的现实，中侨委调整 7 所华侨补校的任务分工：北京、广州和集美 3 所老补校主办先修班和高中补习班，昆明、南宁、汕头和武汉新补校则主办初中补习班。同时，华侨补校积极向普通学校转变，贯彻职业教育方针，以为国营华侨农（林）场培养劳动后备力量。^⑩ 作为桥梁的补校普通化，补习教育转变成升学教育和职业教育，意味着中国针对侨生的特殊

-
- ① 郝维谦、龙正中主编：《高等教育史》，第 613 页；李均：《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1949—2009）》，第 101—104 页。
- ② 《南宁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1961 年秋季参加全国高考总结汇报》（1961 年 10 月 2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X042-001-0121-0027-0031；《南宁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关于 1962 年参加全国高考总结的报告》（1962 年 11 月 2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X067-003-0159-0024。
- ③ 《中侨委一九六一年归侨学生教育工作总结》（1962 年 2 月 28 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4011-003-0043。
- ④ 《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厅关于送方方副主任在中侨委侨务汇报会议（党内）的讲话及方方副主任在中侨委侨务汇报会议（党内）的总结的函》（1961 年 9 月 4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0-1-32-17。
- ⑤ 《华侨大学预科招生工作意见》（1961 年 8 月 31 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48-003-2489-0094。
- ⑥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1961 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年，第 502 页。
- ⑦ 通过 1960 年至 1965 年福建省安置归侨数量变化，可判断归侨及侨生安置在 1962 年基本结束。相关数据参见上官小红：《建国后归国侨生安置工作探析》，《东南亚研究》2017 年第 1 期。
- ⑧ 翟韬：《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美国研究》2013 年第 1 期；Oyen, Meredith. (2010). "Communism, Containment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Zheng Yangwen et al.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pp. 92-93.
- ⑨ 赵既昌：《美援的运用》，联经出版社，1985 年，第 199—200 页。
- ⑩ 《侨生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报告》（1964 年 5 月 7 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4011-002-0051。
-

照顾和教育政策退潮^①。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侨生政策经历三个阶段变化。考察这一时期侨生政策的变动，需要从20世纪整体视野出发。在冷战的背景下，海峡两岸侨生政策呈现竞争性、复杂性特征，从而客观上造成了20世纪最大的侨生回国潮。新中国从实际出发，根据国内形势及国际环境变化灵活调整侨生政策，较好地实现了华侨诉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数万名回到祖国升学的侨生不仅为国家建设事业贡献力量，还加深了华侨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扩大中国与世界在更多领域的交流打下很好的基础。

(本文作者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王婧倩)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2期要目

- | | |
|--|--------------------------------------|
| 关于新中国经济史三个问题的思考 (武力) | 1961年) |
| 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赵学军) | ——基于中、缅、美、英四方档案的历史考察 |
| 国企发展史研究三题 (龙登高) | (李聪慧) |
| “公私合营”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张忠民) | 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叙事的研究及其启示
(李庆云 陈峻杰) |
| 中国式医药卫生现代化的道路探索与实践经验
(姚力) |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民国防教育探微
——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广东为中心 |
| 新中国城市蔬菜供应体系变迁的历史考察
(1949—1965年) (陈礼军) | (周云 孟鑫珂) |
| 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启示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万隆会议
(谢迪斌 孙潇潇) | 1949—1952年北京郊区公粮征收问题研究
(史会景) |
| 中缅边界谈判与美国的干预及失败 (1950— | 小三线建设中厂办集体企业研究
——以安徽为考察对象 (张胜) |

^① 需要说明的是，1965年印尼又发生排华事件并导致新一轮侨生回国潮。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回国的侨生不少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被安置在华侨农(林)场，并非单独安置进补校或普通学校，这批回国侨生更偏向归(难)侨的性质，而非本文所定义的侨生，故暂不作讨论。